



百年前後：追尋、困惑與反省

王智明*

籌辦「百年人文傳承大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不僅涉及了學術、出版及展覽等不同的面向與工作，更是一次歷史性的回顧與前瞻。它不只需要是一個清楚明白的歷史敘事，更需要面對與反省歷史的勇氣與承擔。筆者有幸在總計畫主持人楊儒賓老師與外文學門召集人張小虹老師的帶領下，參與了這個計畫，見證與體察了執行這個計畫的艱難。所以在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的邀請下，不揣辭拙，以個人的觀察與體會提供一些側面的紀錄，算是為這百年難得一見的學術與知識工程添柴加薪，略增一筆註腳。

這個計畫在民國 99 年 2 月 26 日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議，確立了於民國百年國慶前後舉行展覽、出版專書的構想，並於同年 3 月 19 日的第二次籌備會中確認了參與的學門與人員。印象中，我在 99 年 3 月初時就看到了一封國科會徵求參與百年人文大展的電子郵件。當時就對這個構想的規模與難度感到好奇與驚訝，心想誰會犯傻去申請這麼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來做。學門的概念本就不易釐定，百年的範圍既廣又雜，不但擔心有限篇幅難免掛一漏萬，更害怕落筆有失得罪前輩，自找罵名。何況「人文」一詞眾說紛紜，要以學科學門建制史研究來承載人文的深度與廣度更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更令人困擾的是，「百年」是國家慶典的刻痕，不是學術的必然尺規，要將學術的長河與多源硬塞入國家的框框裡豈非強人所難，更不要說建「國」百年的想像與台灣紛雜的歷史與文化現實總是格格不入，相互制肘。究竟怎樣的百年書寫能夠呈現民國人文的全貌，貼近交錯又分斷的歷史，並忠實於土地的呼吸與時代的聲音？從清帝國的崩解開始，走過殖民主義、民族悲情與白色恐怖的時代暗潮，這個「百年人文」如何能夠與整理和清算的後殖民史觀保持距離，在「總結、評說與繼承」的基礎上認識自己、展望未來？¹ 誠如楊

* 中研院歐美所助研究員

¹ 這段文字主要是受到陳光興老師近作的啟發。見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 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84 期（2011 年 9 月），頁 137-241。

老師在總計畫說明裡所闡述的，「一九四九」在政治上所代表的大崩解與大遷移固然造成了歷史上許多不公不義的現象，但是它卻是中華民國人文學術發展史上極其關鍵的一年，為今日台灣蓬勃盛興的學術發展提供了開創性的條件。楊老師是以「雙源頭、兩階段」的方式來理解百年人文的發展，因為「中日雙源」關照到台灣人文發展裡兩股重要的思想源流，而以 1949 年劃分兩階段不但對應大歷史的分斷，更可看見百年長河中人文思想的延續與演進、激盪與融合。「雙源兩段」為中華民國疊合於台灣的歷史與文化現實找到一個詮釋的起點，也為百年人文發展提供了一個反省的契機。因此，如何正面看待在這複雜曲折歷史中出現的學術成果，卻又不失一個真誠懇切的批判立場，正是執行這個計畫最大的挑戰。

對我而言，參與這個計畫注定是吃力不討好的，可是它卻可以提供一個重新思考自身學術範式的機會。對於外文學門來說，就算可以將學門內部的歧異性（語種差異、領域分歧及文學、語言與教學的學科屬性不一）暫時存而不論，「外文」一詞總是習慣性地將我們的視野引向西方。單德興老師就指出，他參與這個計畫的最大體會，就是因為感受到國內學者「對於外文學門建制史不夠重視」；他「希望外文學門自身在引進國外新知的同時，也能留意在本地發展的情形與特色」。² 換句話說，不論是文本、理論還是政治，外文學門總是習以為常的「以西方為師」，其實忽略了這樣的觀點有著深遠而曲折的在地歷史，而且這樣的研究進路往往是台灣的，而不是西方的。不過，除了藉機清理外文學門的建制歷史外，我更希望能夠批判性地看待外文學門的建制過程，在整理過往的基礎上探問「外國文學」這門學問是怎麼來的？歷史上的學術實踐有哪些？又提供了當代台灣人文什麼樣思想資源與知識成果？如果「以西方為師」不是外文學門獨有的學術路線的話（當代學科的建立基本上都是西學東漸的產物），那麼它百年發展的內在理路是什麼？其建制的政治與文化又是什麼？如果「追逐西方的神」只是知識實踐的假像，那麼外文學門的建制與學術原點何在？又提供了哪些思想範式等著我們去挖掘、評說、拋棄或繼承？

在這些問題的誘惑下，我私心自用，硬著頭皮加入這個計畫。外文學門共有七位老師參與：除了張小虹老師領銜演出外，我和單德興老師則負責英美文學的百年發展，並邀集台大日文系陳明姿老師、台大外文系張淑英老

² 私人電子郵件 2011 年 9 月 21 日。



師、淡江法文系吳錫德老師及輔仁德語系王美玲老師來處理非英語外國文學的研究，並同分攤文集與圖錄的編寫工作。在文集裡，我們提供了總論一篇、分論三篇、特寫四篇。總論（由王智明執筆）主要是企圖提供一個歷史觀點來理解百年外文的總體發展。三篇分論為〈比較文學在台灣〉（由單德興老師執筆）、〈日本文學在台灣〉（由陳明姿老師執筆），以及〈打開「世界文學」〉（由吳錫德、張淑英與王美玲三位老師合寫），分別介紹了幾個重要的發展方向，並突出了台灣在這三個學術領域的獨特經驗。四篇特寫則是以 500-800 字的短文速寫幾個外文學門重要的人物與事件：王智明的〈辜鴻銘〉一文旨在介紹這位民初外文耆老的生平與著作，以描繪一條「馬華離散」的外文思想進路。張小虹老師撰寫的〈只是朱顏改〉提醒我們朱立民與顏元叔兩位前輩透過台大課程改革所留下的學術遺產。單德興老師的〈翻譯與冷戰〉則說明了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國文學譯叢在 1970 年代的貢獻與影響。張淑英老師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中譯〉讓我們看到諾貝爾文學獎在台灣所產生的文化效應及外國文學翻譯之於外文學門的意義。圖錄則是在能取得的圖像基礎上，點描一些重要的事件、出版品與人物，並配合大事紀突出外文學門的建制過程及出版。配合文集，我們特別介紹了梁實秋、顏元叔、朱立民、余光中、齊邦媛等前輩，以突顯外文學者之於百年人文思想的貢獻。王美玲老師和陳明姿老師分別提供了輔大外語學院與全台日文學系的珍貴歷史照片，幫助我們記憶這些奠基者的身影。

不過，這樣的安排當然不盡人意、充滿侷限，因為它不僅忽視了外文學門裡同樣重要的語言學與語言教學研究，更漠視了其他「小眾外文」（例如韓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俄文、義大利文等）的存在，亦突出了外文學門就等於英美文學加上日、法、西、德四語的虛像。然而，這情非得已的安排不僅僅是務實考量的結果（因為學門裡沒有學者能夠同時處理不同語種文學的百年歷史），更是歷史條件制約的產物，反映了「雙源兩段」交疊視角的重要性。簡單的說，正是清末民初西學東漸形成了外國文學等於西方文學的疊合，才使得外文學門的形成總是以西方為參照的歷史結果。同樣的，作為戰後台灣一度被禁絕的「國語」、又是最為實用的「第二外語」，日文的存在自然與台灣的殖民歷史脫不了關係，也隱隱挑動著中華民國的歷史記憶。³ 同樣的

³ 比方說，錢稻蓀、周作人等當時於日據時期留任北京的學者，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堪的評價。關於他們的記憶，特別是在外文學門，也就特別的黯淡。

歷史過程造成我們對「小眾外文」的漠視和排除；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與教學缺少了非洲的脈動、拉美的魔幻、中東的色彩及太平洋的樂音。在一個中國等同於外國的時代裡，我們的「外」文想像雖不貧乏，卻也不得不說是頗受侷限的。但是，當我們將外文研究的前身追溯到明清時代的四夷館和四譯館時，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今天理解的外文研究其實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產物。「外國」的範圍從來不是定於一尊的西方，而是對應著自身的民族、地理與政治想像而來的。因此，外國文學與現代性的問題必須被放置在建制史視野的前景。

然而，僅僅是爲了梳理這五個語種的百年建制過程就足以讓人早生白髮、多增皺紋。因此，在這樣的分類與分工中，我們只能試圖呈現百年外文的整體走向及台灣人文的在地特色。在回顧歷史之際，我們試圖記住的是那些先行者的身影與足跡，以及他們的掙扎與教誨。我們能力有限，但野心不小。在最初的計畫書裡，我們曾經列出以下重點：

1. 爬梳各領域的學術建制歷史、課程規劃、奠基代表人物（簡介、著作與相關文物）與相關學會、刊物的創設。以英美文學研究爲例，朱立民先生、顏元叔先生、齊邦媛先生、余光中先生等重要代表人物；1973年創設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1991年創立的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1998年創立的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等主要學術組織；1970年創刊的 *Tamkang Review*、1972年創刊的《中外文學》等主要學術刊物。
2. 凸顯各領域內不同階段的發展重點。以英美文學研究爲例，冷戰結構下美國研究的興盛，70年代比較文學的興起，80年代英美文學的紮根，90年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風行等。
3. 強調跨領域互動的歷史連結。例如比較文學研究興盛時期中文系與外文系學者的密切互動，或晚近外語學院之設立所造成的體制變革等。⁴
4. 進行當代反思，鋪陳文學研究的差異與重複，如何在當前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百花齊放的快速變動中，重新界定所謂的外文文學。

⁴ 雖然1949年後在台成立的公私立大學都會設立英、德、法、西、日等外語學系，但是首次把不同外語學系整合起來的實踐卻是1980年輔仁大學所成立的外語學院。在這之後，東吳（1984）、政大（1989）、淡江（1992）等大學才陸續成立外語學院。



然而，在實際執行計畫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許多地方我們力有未逮。比方說，我們或許可以清楚標誌學科建制的時點與描繪先行者的身影，但是我們對於他們思想歷程與知識實踐之間的關係缺乏深入的認識，對於他們的生平與書寫沒有完整的掌握。我們無法充分說明為什麼 1920 年代以中國哲學與新文化運動成名立身的胡適曾是北大英文系的主任？也未能以外文學門的觀點來展開對辜鴻銘或是周作人作品的學術評價？為什麼最早開始翻譯與教授東歐與日本小說的周氏兄弟從來不被納入外文系的視野？日治時期在台灣教書的日籍學者在西方文學的研究上有何成就，他們在台灣的经验對其外文研究又有什麼影響？1970 年代台灣外文學界對比較文學的興趣到底是一個獨立的現象，還是對 1930 年代中國的比較文學發展的一次繞道繼承？究竟英國學者理察茲 (I. A. Richards) 與燕卜蘇 (William Empson) 對於抗戰前後的外國文學研究有何影響？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外國學者在中國和台灣的意義呢？同樣的，雖然我們可以勾勒各領域不同階段的發展重點，我們還是無法完全解釋為什麼戰後台灣對於文化悠久的印度文學興趣缺缺、對非洲文學毫無認識？為什麼當英美文學研究在 1980 與 1990 年代經歷了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典範翻轉後，日、法、西、德等語種文學的研究仍然步履蹣跚？我們甚至不曾記起四十年間努力創作，經營第三世界文學想像的陳映真原來有著外文系的背景和訓練？為什麼我們對於 1949 年之前的外文學門所知甚少？是因為它面貌不清、距離遙遠，還是因為我們從來不在乎過去，也從未把前人的知識實踐當回事？究竟是什麼樣的學術建制與知識結構制約了我們前進的步伐，在各種教學與研究想像背後又隱含著什麼樣的思想底蘊與文化政治？這些紛紜錯落的研究與出版究竟生產著什麼樣的外文學門？又對後進學者造成什麼樣的規訓與制約？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沒有立即的答案，卻迫切地體認到自身知識的侷限，以及以學門為出發點可能造成的誤導。畢竟知識的實踐，特別是在學科專業化之前的年代，從來不是以學科專業為依歸的。相反的，當時的知識生產或許在今天看來專業性不足，卻有著強烈的現實感與迫切感。對於民初的知識分子來說，生產知識是為了解釋與處理當前的困惑與問題，不是為了滿足專業性的要求。他們甚至可能沒有建立學科的企圖，只有素樸的知識救國與改造社會的理想。在這個意義上，外文學門之「外」不應只是知識的對象，更該是轉化本土社會與文化的力量。類似的心情在 1970 年代的學者身上（如

顏元叔)仍是很強烈的,也可以在近20年的學術發展看見印痕,但是我們未曾有意識地去整理與理解這樣的學術心路,遑論將之理論化為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或主體姿態。

這樣一種近乎失魂的狀況造成了我們尋找展品上的困難。我們到底該展出哪些研究、什麼作品和文件、列出什麼大事、端出誰的手稿,才能充分呈現外文學門的百年風華?誰是代表性的人物,學門有什麼傳統,文物又在哪裡?正是當我們必須以展覽的形式去說明與解釋外文學門的時候,我們發現這些問題毫不抽象,而是高度歷史性與物質性的。於是,在去年暑假前後的幾次工作會議上,我們做了以下的規劃:

- 編寫百年大事年表以提供外文學門建制史的概覽(例如,1917年北大設立英文系、1963年文化大學成立全台最早的日文系與法文系、1973年成立比較文學學會等);
- 編寫書目以建立外文學門學術經典;
- 提供百年奠基人物的生平、照片與手稿;
- 建立當代學者專區,展出外文學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學者手稿。

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規劃卻有著執行上的困難:我們或許可以做出一個百年建制大事紀,但是誰能評斷哪些著作是學門經典?我們或許可以指出奠基人物有哪些,可是該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評價他們的貢獻?胡適、徐志摩、吳宓、梁實秋等民初學者不僅與中文學門有許多的疊合,他們的著作恐怕都無法納入今日外文學門的想像裡。顏元叔、朱立民等一代學人留下了許多文字與建制的遺產(例如,課程改革與成立學會),可是在以視覺元素為主的展覽裡,我們如何呈現他們的思想與立場。余光中老師與齊邦媛老師原是我們當代學者專區裡的主秀,可是一來他們的手稿取得不易,二來他們往往更是以詩人、作家及編譯者的身分,而不是學者的身分,為世人所認識的。那麼我們是該展出他們的詩作與手稿,還是那些以鉛字印刷、不透個性的學術論文?最最關鍵的是,究竟學門的學術內涵如何能夠透過展覽來呈現?我們或許可以把學門相關的所有出版品(從專論到期刊)一字排開,集體呈現,可是這麼一個多元並陳的思想內涵在哪裡?是各自表述的大鳴大放,還是燦爛煙花下的集體失聲?到底學門建制史是一篇百年流水帳,還是一場自我總體檢?



再一次，我們面對的是學門思考的侷限及歷史意識的空白。於是，我們只能將就於可以取得的資料，動用自己本就不多的資源，甚為勉強地再現外文百年。我們感謝在這個過程中所有曾經提供協助的諸多朋友（國家圖書館的蔣嘉寧和張懿文小姐、國立歷史博物館的郭暉妙與陳伶倩小姐、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資料室的吳美慧小姐、聯經出版社的劉洪順先生和台大圖書館特藏組）及朱瑞婷和劉羿宏兩位助理。沒有他們，整個計畫的成果只怕更為單薄與蒼白。

但是，更為關鍵的是我們該如何在走向下一個百年的同時，突破侷限、填補空白。方向在哪裡、可以做什麼？

誠如單德興老師在第三十五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的專題演講裡指出的，⁵ 學門建制史是一個涓涓細流的積累工程，它無法依賴個人之力來完成，而需要每一個系所從正視自身歷史開始，紀錄學術的心路與足跡。就像職業運動對每項紀錄都高度重視一樣。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貼近了解學門建制的過程，同情理解先行者的辛勞與貢獻，進而客觀而公正地評價學術的成就與挫敗，推動學門與學術的發展和進步。具體而言，建制史的工作其實是一種歷史意識的鋪墊，是追逐西方諸神百年後的一次回歸。它要求我們認真看待前輩們走過的路，嚴肅對待他們的思考與心情，並且批判性地總結他們的經驗為方法，走出一條屬於我們的路。同時，外文學門建制史研究的困難也提醒著我們重新思索學科與學門的意義。學門究竟是一個規範性範疇還是經驗性範疇？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面對學科專業化之前的跨學科知識生產，並將之轉化與吸納為學門發展的養分？在一個「以外為尊」的學門裡，我們可不可以鼓勵後繼者去檢討和反省這條學術路線，並接納他們「既中且外、東西不分」的學術實驗？最重要的，走過民國百年之後，我們是否可以走出或擱置師輩的權威和包袱，批判地認識與繼承他們的成就、困惑與失措。或許，這樣的破立之舉才是百年人文最重要的使命。

做完這個計畫，我們的答案不少，但是問題更多，並在叩問之際切身體會到自身的侷限。顯然的，這些問題有賴更進一步的研究及更能夠突破學科界限與使用多種外語的人才。因此，我們只能誠實地面對自身的侷限，不揣拙陋地呈現我們的無知，並期待來者補上缺口。

⁵ 該會議於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南投埔里的暨南大學舉行。

最後，我要再次向整個計畫的負責人楊儒賓老師致敬，是他的視野與高度讓這樣的反省可以邁開腳步。我更要感謝參與外文學門子計畫的所有老師和助理，給我一次學習與深思的機會。當然，國科會魏念怡小姐和何醇麗小姐這一年多來更是勞苦功高，他們的專業與敬業令人感佩。我謹將這篇側記獻給所有為這個計畫付出心力的師長與朋友們。



國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認識史博館 | 史博館之友 | 便民服務 | 參觀資訊 | 活動快遞 | 最新訊息

Exhibits 展覽內容

首頁 > 展覽內容 > 當期展覽 > 一般展覽 > 百年人文傳承大展

一般展覽 | PRINT | 轉寄 | A+ | A-

當期展覽
▶ 一般展覽
常設展
華燈博物館
巡迴展
行動博物館

李鴻章畫像
清末
30.5×25 cm
國立歷史博物館館藏10055

百年人文傳承大展

日期：2011/11/22~2012/01/08

展覽地點：二樓201展廳
二樓202展廳
二樓203展廳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10:00~18:00

票價：全票30元，半票、學生票15元

主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立歷史博物館

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成功大學